

世界巨人传记丛书

·中国文学家卷·

# 苏轼



*Sushi*

海天出版社

K825.6 24 2623

14317



中国文学家卷

北宋·文学家

苏 轼

(1037—1101)

陈 节 著

徐州师大图书馆



22589682

海天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苏轼/陈节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 1999.3

(世界巨人传记丛书·中国文学家卷)

ISBN7-80615-943-6

I. 苏… II. 陈… III. 中国文学家—传记—世界 IV. K815.6

策划编辑 姚敬美 赵同敏

责任编辑 刘东力

封面设计 张幼农

责任技编 卢志贵

---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路南海天大厦

邮编 518026

印刷者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4.5

字 数 77 (千)

版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套

---

定 价 50.00元 (本卷10册)

海天版图书凡属印制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总 序

中国文学家卷主编 马重奇

中国拥有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学。悠久的历史为我们带来无数优秀的文学家、无尽优美的作品、无限广阔的幻想，即穷一生的精力，亦难以窥其全貌。然而若能掌握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认识中国不同朝代的代表文体、闻名于世界的大文学家以及他们的优秀作品，对研究中国文学，必然是一个极大的帮助。因此，我们编撰了这一套《世界巨人传记丛书·中国文学家卷》。这套丛书，反映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诗人、散文家、戏剧家、小说家的最优秀、最伟大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是中国最为宝贵的文学遗产，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本套丛书共有十本，均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学与研究的教授及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这套丛书，虽然着重介绍中国古代十大文学家，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整体脉络。阅读本套丛书，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必将会有一大概的了解。

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经历了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学样式主要是诗歌和散文。虽然它们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却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诗经》和《楚辞》代表着中国诗歌史上两种不同流派，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和积极浪漫主义文

学的奠基者。《诗经》是周初以来广大人民的集体创作。从《诗经》到《楚辞》，是由集体创作过渡到专人著述的时期。屈原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骚体，他打破了《诗经》四言的形式，而采用三四言至七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写作，这可算作文学的革新。《诗经》和《楚辞》同属诗歌，但诗歌体裁不足以表达复杂的思想。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纷乱，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哲学思想以匡时救国，宜于叙事说理的散文便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便出现了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先秦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显要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巨大，尤其对秦汉文学有着直接的影响。屈原是先秦时期最伟大的楚辞作家，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汤化先生的《屈原》阐述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一生。屈原作品以其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浓厚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光辉，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中国后世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并具有无限的生命力。鲁迅曾高度评价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词，卓绝一世”。

秦汉文学是在继承先秦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秦始皇焚书坑儒，箝制思想，这时期的文坛一片空白。直至汉初大力提倡文教，文坛才逐渐恢复生机。两汉文学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汉代散文。汉代散文，不论是政论文、说理文，还是史传文或书翰文，无不继承先秦的说理散文和叙事散文的优良传统并受其影响，因而名篇迭出，丰富多彩。第二类是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汉代辞赋。汉赋是在荀赋，主要在屈宋赋基础上，广泛吸收，并综合了《楚辞》、《诗经》、先秦散文的一些文体特点和创作方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文学。第三类是汉代诗歌，包括汉乐府民歌和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诗歌。它继承并发扬了《诗经》的优良传统，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司马迁是两汉

时期最伟大的传记文学家。叶全君先生的《司马迁》，阐述了西汉伟大的传记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的史家生涯。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代表着两汉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规模宏大、体例完整的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传记文学名著，在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对后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鲁迅曾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五言诗、骈体文和文学批评都有重大发展。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诗人，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动地描写了社会面貌，开创了“建安风骨”的传统。西晋的文学作品内容贫乏，片面追求辞藻和对仗。西晋末至东晋，玄学思想渗入文学领域，出现了盛行一时的“理过其词，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晋末宋初，陶渊明在诗坛上异军突起，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宋齐以来，出现了以描写景物风光为主的山水诗。继而，谢朓、沈约等开创了“永明体”，使诗歌走向格律化。梁陈时，“宫体诗”充斥一时。骈文是在汉赋影响下而产生的体裁，形成于魏晋，全盛于南北朝，并成为当时文章之正宗。在诗文发展的同时，记述怪异传闻和文人轶事的小说也逐渐盛行起来，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文学批评著作，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巨大影响。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很多，其中陶渊明是最优秀的代表。历来论诗的人都把陶渊明看作是伟大的“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叶枫宇、肖成二位先生的《陶渊明》，阐述了东晋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一生。陶渊明的田园诗以赞美田园风光、反映田园生活为主要内容，诗风自然朴素，开创中国古代的田园诗派。陶渊明的作品，不论其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

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隋唐五代文学作品，主要有诗词、散文和传奇小说。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流传至今的就有二千二百多个诗人创作的近五万首诗歌。唐初陈子昂倡导革新，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扫除齐梁以来浮艳华美之风，开盛唐诗风之先。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唐诗的全盛时期。这时出现了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他们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推到了高峰；也出现了以描写山水田园风光著称的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和以描写壮丽的边塞景色，表现驰骋沙场、慷慨从戎的英雄壮士而闻名的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唐玄宗天宝至唐代宗大历时期，社会经济因受到安史之乱的破坏出现了不景气的现象，同时诗歌的创作和发展也受到种种阻碍。到贞元、元和之际，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繁荣。一些关心国家命运的士大夫如白居易和元稹，以学习陈子昂和杜甫为号召，提出诗歌要继承《诗经》的“风雅比兴”传统，反对没有寄托的作品，发起“新乐府运动”。他们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反映人民被压迫的事实，揭露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其中以白居易的创作成就最大。中唐时期，还形成了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派。刘禹锡、李商隐、杜牧也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到了唐末，皮日休、杜荀鹤等诗人，也写了一些反映社会实况和人民疾苦的作品。唐代著名的诗人很多，李白、杜甫和白居易则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诗人。陈定玉先生的《李白》、吴雄先生的《杜甫》和杨志贤先生的《白居易》，分别阐述了中国唐代三位伟大诗人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歌，通过抒写自己一生的非凡理想和遭遇，深刻地揭示了盛唐时期的社会现实和精神面貌，反映了强烈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因其诗歌想象奇特，风格雄健奔放，被誉“诗仙”。他的七古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七绝如《赠汪伦》、《早发白帝城》，都是传诵百世的

名篇。李白的诗歌，无论在精神上和表现手法上，对唐代和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杜甫曾称赞李白的诗是“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在诗歌体裁方面，李白不愧是七言绝诗“有唐第一人”，七言古诗也堪称独步。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纷乱的社会局势，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和强烈的政治色彩。通过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盛变衰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丽人行》、《春望》、《北征》和“三吏”、“三别”等，皆为世人传诵。杜甫对各种诗体的运用都极精工熟练，才华卓著，对后世影响极大。研究杜诗亦成为专门学问，称为“杜诗学”。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领袖。他一生勤于写诗，今存诗作三千余首，为唐代诗人之冠。其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政治的黑暗、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民间疾苦。他的讽谕诗如《秦中吟》、《新乐府》中不少篇章、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等，都是广为传诵的名篇。白诗不仅被后人推重，即在唐代，已经为人争相传诵，甚至流传到日本、暹罗等国，可见白诗的影响深远。

唐代诗歌成就最大，唐代散文的成就也不小。齐梁以来柔靡浮艳和形式僵化的骈体文，日益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自北周至隋屡有人倡议改革。初唐的陈子昂树起了复古的旗帜，并率先用古文进行写作。唐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等人也提倡古文。德宗、宪宗之际，正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士大夫大都反对过于雕饰的骈文，认为是亡国之音。他们从儒家的观点出发，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而质朴的古文正好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在政治上要求革新的同时，进一步要求文学上的革新，因而掀起了“唐代古文运动”。运动的主旨，是提倡写文章必先有充实的思想内容，主张恢复和发扬先秦、两汉散文质朴

流畅的传统，并且大力从事于古文理论的宣传和古文创作，形成一种社会风尚。这场古文运动的主将是韩愈和柳宗元，参与者有刘禹锡、白居易、李翱等人。谢季祥先生的《韩愈》全面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杰出古文家韩愈一生的生活与创作生涯。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是他把新型的“古文”广泛地用于政论、书启赠序、杂说乃至祭文、墓志铭等各种体裁，产生了不少内容精湛、形式优美的文学散文，堪称典范。韩愈在古文运动中写了许多阐述儒家经典理论、倡导古文、反对骈文的文章，提出一整套文学主张，以及他的光辉创作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代民间小说（市人小说）为传奇小说提供了创作经验；古文运动的开展，也为小说的写作提供了灵活而表现力较强的文体；唐代诗歌的繁荣，也在语言、意境等方面，给传奇小说以丰富的营养。至贞元、元和年间，传奇小说的写作出现了十分繁盛的局面。

宋代文学作品，主要有诗、词、散文和白话小说。宋诗的风格和趋向曾有好几次较大的变化。但总的说来，宋诗“以议论为诗”、“言理”的倾向，发展得很厉害，变成散文化的“以文为诗”。词的产生可远追溯到隋代。到晚唐、五代，文人词的创作达到高潮。到宋代，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出现一批诸如柳永、苏轼、贺铸、周邦彦、秦观、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等著名词人。宋代散文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另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三百多年间，便出现了大量散文作家，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唐代的俗讲和变文，到宋代便演变而成为“说话人”的话本。宋代话本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在这一时期，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是大文学家苏轼。陈节先生的《苏轼》，阐述了北宋大文学家苏轼的

文学艺术发展道路。苏轼在散文、诗、词诸方面都有很高成就。其文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向来与韩愈、柳宗元三家并称；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在艺术方面独具风格；其词以高旷清雄的风格，开创豪放一派。苏轼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成就，达到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最高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杂剧是元代文学的主流。元代杂剧是宋金以来在民间讲唱文学的基础上，综合了宋词的成就，并直接发展了金代诸宫调而成的一种歌舞剧。在元代，出现了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和剧本。钟嗣成《录鬼簿》著录元杂剧四百五十八种，朱权《太和正音谱》著录元杂剧五百三十五种，这些杂剧流传至今的还有一百三十六种。关汉卿是元代最杰出的剧作家。涂元济、江五生二先生的《关汉卿》，阐述了元代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艺术生涯。关汉卿“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是我国戏曲史上最早的也是最伟大的戏曲家。他一生创作了六十多本杂剧，广泛地反映了元代被压迫人民的苦难生活，歌颂了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揭露和鞭挞了当时的黑暗政治和腐败的社会风尚。关汉卿对创作杂剧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使他成为元杂剧的奠基人物和元代剧坛的领袖。《窦娥冤》、《救风尘》、《拜月亭》等均为我国古代戏曲中优秀精品，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极大。元代著名的剧作家还有马致远、王实甫、白朴、宫天挺、郑光祖等人。马致远的《汉宫秋》、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宫天挺的《范张鸡黍》、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和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等，都是数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著。

明清两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小说时代。在明代，文言小说处于低潮时期，白话小说却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白话短篇小说，成就卓著的是“三言”、“二拍”五个集子。此外，明代的长篇

小说也盛极一时。不但有罗贯中《三国演义》、施耐庵《水浒传》、吴承恩《西游记》和笑笑生《金瓶梅》等名著，还有《风神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也都各有价值。清代小说，以曹雪芹《红楼梦》、蒲松龄《聊斋志异》和吴敬梓《儒林外史》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发展的最高峰。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以曹雪芹的成就最高。欧阳健先生的《曹雪芹》，反映了清代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的生活道路。曹雪芹博学多才，为人清高，是清代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其代表作《红楼梦》原名《石头记》，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通过一个贵族官僚大家庭的盛衰史的描写，塑造了许多典型人物形象，对黑暗腐败的封建社会，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和批判，成为我国古典小说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最高峰，问世后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百多年来，研究《红楼梦》已经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红学”，足见《红楼梦》对后世影响的深远。

以上简介了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概况及十位伟大文学家的文学成就。《中国文学家卷》(10本)均包含以下内容：一、文学家的时代和生平；二、文学家的创作道路；三、文学家代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四、文学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每部传略均能以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来阐述每位文学家伟大而不平凡的生活道路和文学艺术生涯。这对于大中专院校的青年学生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以及最伟大的文学家的文学成就，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马重奇识

1999年1月7日于福州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  
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  
也。

——苏轼《文说》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  
文，如天地奇观。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

## 目 录

- 1 山雨欲来风满楼  
——苏轼生活的时代 ..... 1 5
- 2 “一门父子三词客”  
——苏轼的家世 ..... 6 13
- 3 身如不系之舟  
——苏轼的政治生涯 ..... 19 50
- 4 融会三家 圆通应物  
——苏轼的思想 ..... 69 11
- 5 诗赋传千古 峨眉共比高  
——苏轼的文学成就 ..... 80 37
- 6 梅花香自苦寒来  
——苏轼成功的奥秘 ..... 117 11

## 1 山雨欲来风满楼

——苏轼生活的时代

殿前都点检

公元960年元旦，担任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兵至陈桥驿，在弟弟赵匡义、部将赵普等人的拥戴下，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宋朝。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戏剧性场面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为了防止方镇效法他的篡权伎俩，他即位不久，就要了个“杯酒释兵权”的把戏，解除了大将石守信等人的军权，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兵制的措施，如选练禁军，加强中央军事力量，削弱地方兵力；实行“更戍法”，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甚至授以阵图等等。这些措施的实行，固然防止了割据复辟，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但是也造成了北宋对外战争的失利。

公元979年、986年，宋太宗赵光义两次对辽用兵，企图收复石敬瑭割让给辽的燕云地区，但是屡战屡败。而在同时，党项族的首领李继迁也在积蓄力量，觊觎中原。公元1004年，辽主耶律隆绪同其母后萧氏共率大军挥戈南下，造出欲吞灭北宋的声势。孱弱的北宋君臣束手无策，朝野一片惊慌。虽然宰相寇准力主皇帝赵恒御驾亲征，但最后

还是在澶渊和辽签订了屈辱的和约。从此，北宋每年向辽朝输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澶渊之盟”的订立，暴露了北宋政府甘心示弱于外族政权的懦弱本质。

在和契丹贵族进行妥协外交的时候，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也乘机骚扰西北边境。北宋王朝“一视同仁”，也以输出银绢的手段换来苟安的局面。当时和西夏签订和约的大臣做梦也没料到，事情只隔四十年，这支小小的异族政治力量，竟能迫使堂堂北宋政府不得不将每年送去的银绢数目由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增加到银七万两、绢十五万五千匹、茶三万斤！

北宋王朝对外从消极防御转而演变为退让妥协的屈辱外交，对内则是“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余”（赵翼《廿二史札记》）。朝廷上下沉溺在对声色犬马的追逐之中，皇帝就是其中最大的贪污腐化分子。仁宗皇帝举行祭祀天地的大享明堂礼，一次就耗费国库一千二百万贯。高级官员恣意淫靡，用度没有节制。吕蒙正身任宰相，每天必吃鸡舌汤，杀下的鸡毛堆成了山。仁宗时杭、越、苏、秀各州旱涝连年，饿殍横路。朝廷派淮南转运使魏兼去处理赈灾事宜。魏兼却在杭州留连不去，“穷彻昼夜，歌乐娱游”，把饥民关在庙里，三天内饿死了许多人。当时民谣唱道：“绕梁歌妓唱，动地饥民哭。”全国各地大批的吏员，没有规定的俸禄，就以“受贿为生，往往致富”。北宋有一个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宋真宗时，一次裁减的冗吏就达十九万五千八百多人。这个人浮于事的官僚

集团，治国安邦之策没有，贪污受贿之术不少，朝廷又没有监督的机制，只以“大度宽容”的“祖宗旧法”来对待这些“硕鼠”，所以官员们互相包庇、有恃无恐，吏治大坏。

宋朝的统一和经济关系中的某些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但是它的负面是官僚、地主、商人一方面无限止地兼并土地，采取各种手段迫使农民破产亡家，一方面又享受着政府赋予他们的种种特权，如免税免役之类。英宗赵曙治平年间（1064—1067），北宋政府的《会计录》宣布说，当时纳税的土地共为四百四十余万顷，约占全国垦种土地数额的十分之三，“而赋税所不加者，十居其七”，就是说，还有上千万顷的土地，已落入不必交纳赋税的官绅豪右之手。拥有全国土地十分之七的官绅豪强，从其人口来说，充其量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贫苦农民和半自耕农，是当时皇室、官僚机构、庞大的军队的巨大消费以及向外族统治集团缴纳的“岁币”的主要承担者。

对外以重币来换取苟安，对内鼓励官僚阶层“多置田产、歌儿舞女”，以消磨野心家们的意志，这样必然加紧了农民的掠夺剥削。当时不仅是贫苦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甚至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和富裕农民，也由于徭役、赋税的繁重而倾家荡产。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流离失所、辗转填尸沟壑，或揭竿而起、聚众惊扰州县。北宋统治者坚持“内患深为可惧”的观点，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是“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

的“养兵”政策，把可能“造反”的农民招募到军队中来，免得他们铤而走险、武装暴动。北宋建国之初，军队只有二十万人，九十年后的皇祐元年（1049年），就已增加到一百四十万人。这一支庞大的队伍每年所用的军费，是政府每年向农民搜刮所得的六分之五。另一种措施是在军事部署方面，把绝大多数兵力安顿在首都开封附近和各个主要州郡之内，而对辽和西夏的防御，实际是唱的“空城计”。这样的安边之策，自然挑逗了外族的野心。而边关烽火告急，朝廷又要征敛兴师用兵之费。仅以庆历年间抵御西夏一战为例。战前，每年从陕西诸路征收的钱、粮、绢、刍藁，各项为数不满两千万，而开战以后，各项立即增加到三千四百万，较原数增多了十分之七。这样又加深了宋王朝的财政危机。所以富弼在《乞选任转运、守令以除盗贼疏》中说：“西鄙用兵以来，骚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怨嗟……”，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农民和士兵的反抗此起彼伏，“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多于一伙”。腐败的北宋王朝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内外交煎的危机，无情地撕开了表面的歌舞升平、海晏河清，而裸裎了它积贫积弱的本质。

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主阶级中的一些改革家提出“变法”要求，希望通过革除弊政，缓和危机，换取长治久安。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全国军事机关的副长官），开始了“庆历新政”，但这一次变法实行不久，就因